

编委会

主任：王保旺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春萍 王运生 王晓蒙
王献臣 孙建设 何成洲
吴立正 张长顺 张新华
李兴根 孟新生 范士富
郑莉芳 侯怀青 胡新科
秦志新 程天胜

主编：张新华
副主编：秦志新 孙建设
编务：毕 阳

主办：中共新乡市委党史研究室
新乡市中共党史学会

编辑出版：《新乡党史》编辑部

发送范围：省主管部门、市四大班子
领导、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
驻新高校、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省
辖市党史研究室

地址：新乡市人民东路甲 1 号
中共新乡市委党史研究室

邮编：453003

电话：0373-3696300

电子信箱：zgxx3696@163.com

准印证号：河南省连续性内部资料
〔新乡〕0028 号

印刷：新乡市商务快印有限公司

新乡党史



XINXIANG CHINA



15

改革开放初期

新乡地区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进程

CONTENT 目录

◆ 纪事

- 04 在思想洗礼中砥砺奋进
——我党十次重要整党整风和
学习教育活动回顾

◆ 英烈风采

- 09 英烈浩气贯长虹
——记延津县革命英烈王锡珍
的生前身后事
/ 杨晓玺

◆ 牧野春风

- 15 改革开放初期新乡地区推行农业生
产责任制的进程
/ 孙元俊

◆ 往事回眸

- 21 习仲勋视察新乡地区三市两县
/ 秦志新
27 新乡地区大跃进记事（续一）
/ 王玉堂 张寅生 王定邦
30 工作在封丘
/ 聂峻华
36 桥北小学事件
/ 史文



31 新乡地区大跃进记事(续一)

◆新乡·故事

22 抗日期间新乡人民冒死营救美国
飞行员

37 明星茶社里的“生意”
/ 孙建设

◆论坛

25 如何编写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专题
/ 党言

◆特辑·清明哀思

三潭八壮士
四十七烈士
郟封突袭战

◆史海钩沉

32 毛泽东打“大老虎”

◆大事记

41 中共新乡历史大事记

封面说明：20世纪50年代新乡市卫河航运繁荣景象

封底说明：① 1952年建成的新乡市百货大楼

② 1957年建成的新乡市平原商场

③ 1958年建成的新乡市卫北商场

④ 1960年的新乡市平原路



在思想洗礼中砥砺前行

——我党十次重要整党整风和学习教育活动回瞻

古田会议： 首次确立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建党

八七会议后，党组织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受到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何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如何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即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丰富经验，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确立了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以及“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等的军中党组织原则。针对错误

思想，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纠正方法。古田会议提出的基本原则很快在红军中得到实行，并对此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丰富经验：在政治上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严格掌握入党条件；在思想上加强学习，提高党员思想觉悟。重温古田会议精神，使我们更加坚信，只有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确保我们党长期执政、永远执政。

延安整风：清除教条主义

为了清除教条主义，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

从1941年进行党内整风到1945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开展了一次全党范围内的大规模思想教育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

整风运动以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马克思主义作风为主要内容。毛泽东在运动中提出“惩前毖后，治病

运动是基础和前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重要途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有效方法，密切联系群众是核心问题，从高层领导抓起是关键问题。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对于我们即将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性和现实指导性。



延安整风时干部战士集中开会

救人”的八字方针，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恰好相反。运动分为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五个阶段。在整风过程中，中共中央大力提倡调查研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标志着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达到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延安整风实践表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开展大规模的学习

土改整党：“三查”、“三整”

1947年至1948年，针对部分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组织中存在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等问题，根据全国土地会议关于整党工作的部署，各解放区党组织密切结合土地改革进行整党。

这次整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整党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采取说服教育为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并公开党的支部，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党的支部大会，接受群众监督。对少数被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操控的党支部，由上级组织派



土改整党开辟“开门整党”的新途径

出工作组重新组建党支部，协助整党。

土改整党开辟了“开门整党”的新途径。整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党的作风，推动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也使党群关系得到考验，党群关系日益密切，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实践证明：党群关系的好坏是检验整党的成效重要标志，关乎革命事业的发展 and 党的生死存亡。在当今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中，我们党只有更加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执政水平能力，增强执政能力，带领亿万民众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建国初期的整党整风运动： 提高执政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部分党员骄傲情绪滋生，出现了官僚作风和思想、组织不纯等问题，党中央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开展了整风和整党运动。

1950年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整风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干

部。1951年2月，中央又提出以三年时间进行一次整党的任务，要求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形势下，对党的基层组织普遍进行一次整顿，提高入党条件，慎重进行城市及新区的建党工作。整党分学习、登记、审查和组织处理四个阶段，着重思想整顿。这次整党一个新特点就是紧密联系当前工作，与“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查处了一批有贪污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党员干部及少数腐化变质分子。经过整顿，党的组织成分和党员素质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对党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重大作用。

历时四年的整风整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整风整党运动。我党从过去领导武装斗争掌握局部政权，到执掌全国政权领导人民建设新社会、新国家，在这划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党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执政水平、执政能力以及党员素质都亟待提高。如何更加适应党的自身状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转变，怎样建设不断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合格执政党，仍然是我们党长期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当时街头“整风”宣传标语

改革初期全面整党： 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年内乱的流毒尚未完全肃清，党内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良倾向等问题。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这次整党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基本任务。前期通过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等方法，提高认识，纠正错误；中期以整顿以权谋私歪风和

官僚主义作风为重点；后期进行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开除党籍3.4万人，不予登记9万多人，缓期登记14.5万人，受党内处分18.4万人。通过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方面取得较大成效，也积累了一些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重要经验。

这次整党是我党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开展的整党。它始终注意正确处理整党工作同改革、建设工作的关系，以发动群众充分参与但又不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成功地避免了“左”的做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上来，为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讲”教育： 新时期加强党性党风教育的成功探索

针对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还不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等问题，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

“三讲”教育活动为期三年，以推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加强党性修养，改造主观世界为主要任务，发扬延安整风精神，采取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到2000年底，全国党员，尤其是70万党政领导干部共同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

“三讲”教育既体现了整风精神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又汲取历史经验，摒弃了历史上的整风“左”的弊端，在探索不搞政治运动、妥善解决党内问题、提高干部素质的新路子迈出了新步伐，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保

持党员先进性的一次比较成功的探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 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崭新实践

随着改革日益深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就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切实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为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特别是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同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意见》。

教育活动分学习培训、对照检查、整改提高三个阶段，采取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坚持学习教育和推动农村工作相结合，上下结合、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原则，首先在乡镇和县（市）部门开展，逐步扩大到村一级班子和部门驻乡镇单位。活动历时两年，1500多万农村基层党员和干部参加了学习，基本达到了“让干部受教育、使农民得实惠”的要求，促进了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这次学习教育活动是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时俱进的崭新实践。其成功经验和有益启示主要有：学习教育活动必须与人民得实惠紧密结合，坚持学与用，知行统一；学习教育活动必须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坚持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学习教育活动必须密切联系基层实际，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这次学习教育活动为十六大后在全国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根据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央决定从2005年1月开始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线，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教育活动与生产工作“两不误、两促进”的原则，对全国6800多万名党员进行了一次集中教育，基本实现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的目标。

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充分运用了过去教育活动的成功经验，同时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总是不断赋予党的先进性新的内涵。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标志着我党将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成功实践

面对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带领全国人民走科学发展道路的新课题，根据党的十七大部署，中央决定，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实践活动自上而下，以

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全体党员参加，按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三个阶段分三批进行。通过学习实践，全国370多万个党组织得到锤炼锻造，7500多万名党员经受了精神洗礼。

这次学习实践活动始终注重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紧密联系实际，边学边改，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次富有成效的实践。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探索密切联系群众的新路径

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活动要求，进一步突出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分批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对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文章摘自人民网）



1945年7月14日上午，贵州省息烽县快活岭的一片荒岗上，噼噼啪啪一阵枪响，七条鲜活的生命瞬间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们的英勇事迹也像他们的宝贵生命一样淹没在这莽莽群山之中。

在那风雨如晦的历史岁月里，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与自由，不惜抛头颅撒热血，献出了珍贵的生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有的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永远沉睡在历史的长河里，有的则多年后才被发现。但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着他们的英雄业绩，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延津县革命烈士王锡珍及其特工小组就是这么一个被历史尘封了近四十年之久的革命英雄团体。本文开头叙述的即是他们被国民党秘密枪杀情形。

王锡珍，又名王席珍，字聘卿、席之。王锡珍烈士是延津县最著名的烈士，也是延津县加入共产党最早、介绍人级别最高（介绍人为叶剑英）的一名共产党员。

王锡珍1917年出生于延津县丰庄镇飞王村一个小富家庭。由于家道还算殷实，其兄弟三人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王锡珍1931年滑县师



作者近照

范肄业，1932年考入国民党军政部通讯兵团教导大队第二届无线电通讯班学习无线电，后供职于南京毗卢寺，参与军事通讯工作。1934年，王锡珍遵父母之命和本乡一王姓女子结婚，因对这桩婚姻不满意，婚后9天，即离家归队。1937年初，王锡珍回到家，对父亲说不愿继续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干了，父亲就此劝他留在家乡当个教员，但他未置可否。之后，他又离家外出。1938年给家里写过一封书信，称已改名为“席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王氏家谱》

记载：“抗战军兴，（王锡珍）转战各地，曾在南昌、福建、西安、重庆等地工作，于鄂西会战宜昌三斗坪，（后）行踪不明。”

实际上，抗战爆发后不久，王锡珍即调入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任报务员，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戴笠为总头目。这是一所庞大的现代化通讯中心，大部分机件来自美国，是在美国谍报机关援助下建立起来的。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大量秘密特工，为蒋介石及暂时立足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提供国内外的情报，发布各种各样的秘密指令。

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情况下，面对国民党纸醉金迷的腐化生活，王锡珍逐渐认清了其积极反共、腐败无能的本性，同时，他还看到了国民党大后方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大失所望。王锡珍的思想逐步倾向于革命，遂与同事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五人，秘密与位于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办事处“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取得联系。并偷偷订了一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几个人暗地里互相传阅，同时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也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位于重庆市郊一处红色岩石之上，所以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

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就是在这里领导着大后方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南方局设有军事组，叶剑英兼任组长，成员有李涛、曾希圣、边章五、雷英夫、张清化等。

1939年10月，经中共南方局领导叶剑英、曾希圣、雷英夫批准，王锡珍等人被秘密吸收为中共党员。此后，他们与我党从延安派往重庆的女共产党员黎琳取得联系。黎琳，1921年5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母亲是北大学生黎丽华，父亲是川军军长余安民。有资料显示，黎系余安民的私生女，其母后来出走英国。黎琳在延安时与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李清结婚（李解放后任交通部副部长）。黎琳原名余薇娜、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因父亲包办婚姻和父亲闹翻，投奔延安。在去往延安路上先后改名余慧琳、黎琳。到重庆后改名为张露萍，时年18岁。叶剑英指派张露萍担任国民党军统电讯中心地下党特支书记，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由黎负责指使王锡珍他们，利用身处敌人心脏的有利条件，尽最大努力猎取国民党的各种军事政治情报，然后传送到牛角沱黎琳住处，再由黎转送到中共南方局。王锡珍他们还经常按照黎琳的安排，利用电台值班空隙，巧妙地向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直接发出密电。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军



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各种行动计划等绝密情报都通过他们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南方局或直接发往延安，军统几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任务被我党掌握。根据他们及时提供的情报，重庆地下党机关和工作人员遇到多次险情均得到了安全转移。由于他们提供的情报及时、准确，我党得以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使得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屡遭失败。这个特工小组就像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搅得敌人叫苦不迭。当时正值抗战的关键时节，但蒋介石集团却千方百计向我边区渗透，多次派遣特务到我根据地刺探情报。

有一次，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派遣了一个三人潜伏小组，携带微型电台，欲通过胡宗南的防区，混入我陕甘宁边区刺探情报。行前，戴向胡发电报称：“吾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一行三人携带小型电台，要通过贵防区混入陕甘宁边区，请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王锡珍他们及时将这一消息传送给南方局，由南方局通知了边区政府。结果这个潜伏小组刚到边区即落入我边区军民早已织好的天罗地网中，后该潜伏小组被我边区政府遣回。戴笠找到该小组长大加训斥。小组长也是莫名其妙，说：“我们走的都是羊肠小道，且胡长官已经派人探过路了，根本没有敌情，但不知怎么回事，刚到那边就被他们捉住了。”此次行动不仅使该潜伏小组携带的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为我党增加了一条揭露驳斥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重要筹码。其破坏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再一次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对戴笠来说，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

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活动均被共产党“未动先知”。张露萍和王锡珍他们的这个特工小组为我党及时挫败敌人的各种政治军事阴谋及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蒋介石大为光火，多次责骂戴笠。老奸巨猾的戴笠也不禁满腹狐疑，心想莫非是无孔不入的共党在军统内部安

插了“耳目”？于是他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求“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迹象，一律先拘后审。”于是，在军统局内部，敌督察人员立时像猎犬一样东闻西嗅起来。

特工工作时刻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突发事件，有时巨大的危险反倒安然度过，有时偶然的疏忽或微小的不慎却会导致无可挽回的损失。就在敌人严密监察之际，特工小组成员张蔚林（和张露萍对外以兄妹相称）在机房值班时，碰巧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

真空管烧坏本是耗材的正常损耗，没必要大惊小怪，大不了受到军统内部的一个小小的纪律处分。但张蔚林却认为事关重大，连夜擅自逃离禁闭室跑到曾家岩作了汇报。南方局组织上分析认为，烧坏真空管只不过是工作上的过失，最多受点处分，张蔚林应该立即回去找军统领导检讨此事。但这时军统特务已赶到他家中进行搜查，搜查中，竟然意外地发现了军统局对外电台配置图和密码代号的记录手册（按军统规定，这些东西是严禁拿回家的）。最为致命的是张露萍那本笔记本，除了七人的名单外，还有王锡珍、陈国柱的入党申请材料都夹在里面。等到张蔚林返回来，敌人立即将其逮捕。

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知身份泄露后，迅速翻墙逃出了电台大院，跑到周公馆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当即决定让冯传庆化装成商人，连夜过江去延安。然而，冯传庆刚刚渡过嘉陵江，即被埋伏的特务抓获。

当晚，电讯总台被敌人层层包围，王锡珍等人旋即被捕。因特工小组负责人张露萍此时正在成都探亲，敌人设计以张蔚林的地址和名义向其发了一封电报将她诱回重庆予以逮捕。就这样，包括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这就是

在军统局轰动一时“军统电台案”。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山城重庆的军统电讯总台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几乎瘫痪。戴笠立即命令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安排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军统电台案”也让蒋介石万分震惊，戴笠更是气急败坏，他万万没想到一向以为组织严密、牢不可破的军统局内部，竟出了这样的事。此后，他曾懊丧地对一位亲信说：“这是我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也是我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



当年关押王锡珍烈士的息烽集中营“仁斋”

败！”

将七人抓获后，戴笠如获至宝，和司法科长余铎亲自审理这个案子，企图从这一帮子年轻人身上榨取些有价值的东西来，他们先是威逼利诱，然后进行严刑拷打，但敌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其实，王锡珍他们何止不知道生命的珍贵，何止不知道自由的幸福？但崇高的革命理想使他们早已置生死而度外，他们既没有屈服于电击火烙的各种酷刑，也没有顺从于“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虚伪规劝。黔驴技穷的戴笠命令余铎判处张露萍、王锡珍等7人死刑。案件呈报蒋介石批准时，蒋思之再三，签发了“暂缓执行”的批示，他还想继续软化他们，以期把他们作为一张反共的王牌。后经蒋介石批准，

将他们7人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的罪名囚禁于白公馆。

在白公馆看守所，张露萍、王锡珍始终和大家团结在一起，坚持对军统电台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他们一直提醒大家要时刻牢记地下工作纪律：“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1941年3月，张露萍、王锡珍等人由白公馆被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其中王锡珍和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坐

同一辆囚车，且和韩子栋共用一付手铐。息烽集中营又名阳朗新监，对外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坐落在息烽县城南6公里阳朗坝猫洞，距贵阳72公里，距重庆370公里。这里原来是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寨，后建成一个用高墙、碉堡、铁丝网等构筑起来的监狱。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紧紧围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大牢房。其中王锡珍被关押在“仁斋”里。从1938年秋到1946年7月，整整8年间，这里先后关押了1200

多名“犯人”，被杀害和折磨致死的达600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韩子栋等同志和马寅初先生，杨虎城、黄显声将军以及广为传颂的“小萝卜头”都曾长期被囚在这里。

由于息烽集中营的规模和地位远在其他监狱之上，因而在抗战时期，军统称它为“大学”；称“渣滓洞”等其他牢狱为“中学”或“小学”。它是抗战时期军统的“天”字第一号监牢。

在一间长不及两丈、宽不到一丈的监房里关着17个人。监房内的十六七个人每天只有两担水。吃喝洗碗、刷牙洗脸、洗衣洗澡、洗马桶等，统统由这两担水开支。水成了宝贝，新鲜空气更是宝贝，屋里的汗气、炭气、霉气、尿臊气等等，令人窒息！

在狱中，国民党特务继续软硬兼施，可始终未能如愿。一次，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浙江江山人，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三剑客之一，绰号为“书生杀手”。1990年在美国去世。）拿着一份“悔过书”让王锡珍等人签字，王锡珍假意应允，接过笔来，奋笔疾书“革命无罪！何悔之有？”并怒斥敌人白日做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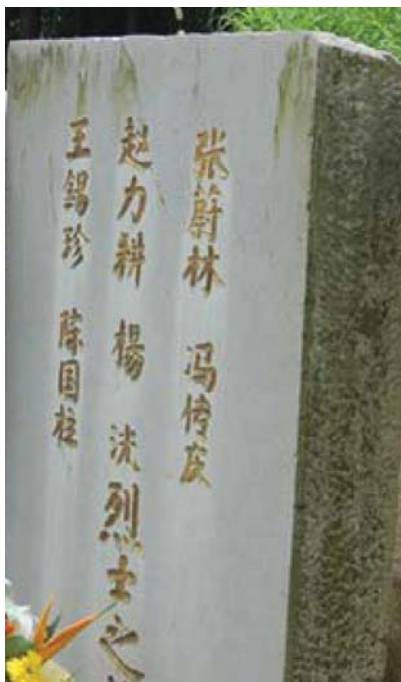
在狱中，王锡珍积极参与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的活动，与难友们一道反迫害，宣传抗日，宣传马列主义。面对敌人的无数次诡计，王锡珍抱定了必死的信念，毫不动摇，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和革命者大无畏的斗志，深为难友们敬佩和称赞。

1945年初夏，戴笠到息烽集中营巡视，见王锡珍、张露萍他们仍无悔改之意，大为光火。6月下旬，返回重庆后的戴笠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1945年7月14日上午，周养浩派手下特务刘振乾、荣为箴二人带队，通知张露萍、王锡珍他们收拾行李，说有专车送他们到重庆开释。张露萍、王锡珍他们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平静地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后，毅然转身，大步朝刑车走去。汽车行驶到离息烽县城3公里处的快活岭，在军统局被服仓库前停下，下车后，七人昂首挺胸，从容不迫，带着几十斤重的镣铐高唱《国际歌》，随之，枪声就响了起来。其中张露萍身中6枪，时年24岁，王锡珍时年29岁，年龄最大的陈国柱也只有33岁。七位英雄的身躯和他们的英勇业绩迎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一度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由于张露萍、王锡珍等7人从事的是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狱中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牺牲后，消息封锁严密，加之他们的负责人张露萍出于工作的需要，在敌后工作时多次出入于重庆的声色场所，一度被延安后方一些人认定为“叛徒”“特务”而嗤之以鼻。解放后，她化名张露萍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事

迹一直不为人所知，更是与烈士资格无缘。相反，特别是张露萍由于前面提到的种种谣言，在张露萍牺牲后近40年的岁月中，一直背负着“叛徒”的骂名。

由于“军统电台案”的环境特殊性，缺乏一定的原始档案材料，故此，多少年来就成了一桩疑案，沉冤几十年都没能还其本来的真相。那些“叛徒”和“特务”的帽子始终蒙在这七位烈士头上，害得他们不能见光，不能见天。为了不使这些英魂再无限制的蒙受不白之冤，当年担任南方局军事组领导的叶剑英元帅曾欲为他们洗冤，但却有阻力。历史进行到1962年，在原国民党保密局上校处长沈醉先生（解放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书里，总算对这七位烈士遭受枪杀的事实，有了一个明确的词证。沈醉是军统局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所披露的词证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沈醉先生面临要加罪于他的那种形势，还是淡定地跟那些造反派说，不能昧着良心讲瞎话，要如实地写出历史，反映历史。在沈醉先生以后出版的众多回忆军统生涯的书中，都积极地为历史披露出更多有价值的史料。特别是他政治生命得以转变后，更没忘记那些蒙冤几十年的英魂。他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身份行使权力，毅然再次提出“息烽快活岭七人冤案”问题，沈醉先生为这七位冤魂牵肠挂肚到最后。《红岩》里华子良的原型人物韩子栋也为这七位冤魂牵肠挂肚一辈子。1980年，韩子栋获悉党有指示，要查清息烽监狱遇害者问题。他马上以监狱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的身份向党作证，确认张露萍等七位同志是忠诚的党员，杰出的爱国志士。我们党本着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12月向四川省委组织部下达了有关查清中美合作所监狱遇难者问题的重要指示。四川省委组织部成立复查专案小组，亲赴重庆、贵州、北京等地查阅了大量敌伪档案、原始记录，询问了健在的狱中难友和知情人，走访了当年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叶剑英、曾希圣及原军统特



王锡珍烈士纪念碑

通过王锡珍遗骸上的水壶、皮带，也确认了其身份。历经一年有余时间的核实，在彻底查清张露萍七烈士情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为烈士正了名，平了反。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才大白于天下，终于让七位英魂有了一个应有的名份而彪炳史册。

贵州省息烽县政府 1985 年春天为他们竖立了烈士纪念碑。王锡珍等 7 人被评定为烈士，张露萍则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烈士。之后，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采用访谈方式，以艺术的形式，以主要当事人张露萍为原型，拍摄成电影《巾帼英烈》，笔者也通过这部电影认识到“王锡珍”的英勇形象。1990 年 12 月，作家陈寿宏、吴耀庭再次创作出电影文学剧本《军统电台案》向电影问世百年献礼。（此剧本 2003 年 5 月参加首届中国通俗文学英才大赛，获影视文学类“银奖”。）之后，安徽电视台、北京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等也先后以《红色女特工张露萍》《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等名称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披露。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历史的丰碑》专题节目中也对这一事件做了介绍。

务沈醉等人，行程了二万余里，跨越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走访一百多位相关人员，查阅了众多的当时史料。又赴息烽烈士殉难处对七人遗骸进行了发掘，通过张露萍手指上的戒指，确认了其身份，通

新中国成立后，延津县政府出版的首部《延津县志》（1985 年）将王锡珍载入“革命烈士英名录”篇，延津县革命烈士陵园也把王锡珍的事迹制作成宣传版面予以介绍。1994 年笔者曾根据有关资料撰写过一篇小文，发表在当年《新乡日报》12 月 29 日第 3 版上。2012 年春，滑县有关部门也曾到延津民政部门调查了解王锡珍英勇业绩（因丰庄镇当年属滑县辖），予以纪念。英雄若九泉有知，当为之含笑。

2009 年 2 月 25 日，我省的《大河报》以《红岩英烈长眠 60 载本网联手当地媒体寻找河南骄傲》为题发布了重庆红岩连线为 171 位红岩英烈寻亲的消息，文中提到有 3 位河南籍的烈士还没有找到亲属。当时说王锡珍是河南洛阳人（一说系河南卫辉人），消息发出后，我省各界人士（包括笔者）纷纷致电大河报询问详情并提供线索。3 月 20 日上午 9 时，河南省中部崛起促进会经贸工作委员会的李青运主任去电称：“在看到大河网关于为烈士寻亲的新闻时眼睛一亮，我坚信王席珍烈士就是延津县的王锡珍。”李青运还向大河报记者提供了王锡珍的相关资料。情况落实后，重庆方面曾发函邀请王锡珍堂孙王秀山前往参加重庆市举办的“11.27”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因经济原因，王秀山未成行，实为遗憾。

息烽集中营旧址 1997 年 5 月 29 日正式对外开放。“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在黑暗的囚牢和敌人的酷刑面前，王锡珍等先烈们英勇不屈，正气浩然。他们远大的政治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忘我的牺牲精神和不屈的英勇气节，必将感召着一代代后来人。这些英雄业绩彪炳史册，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把他们的事迹整理出来，不仅是对烈士的最好纪念，而且也是为了教育后人。

作者简介：杨晓玺，男，1969 年 6 月生，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共党员。现在延津县城乡规划局工作，兼任县作家协会主席，政协委员。



改革开放初期 新乡地区推行农业生产 责任制的进程

■ 孙元俊

新乡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探索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的。当时农业生产比较先进的新乡地区，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探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改革开放初期，新乡地区 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新乡地区广大农民从此前长期“极左”思潮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对发展生产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0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

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通知》，中共新乡地委认真贯彻中央、省文件精神，继续稳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在“三不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基本核算单位不变、统一分配不变）、“四统一”（统一计划、统一投资、统一耕种、统一使用劳力、畜力和大中型农机具）的前提下，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管理责任制。

据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牛建国讲述：新乡地区的农村改革是从探索和执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开始的。在最初两年里，全区改革的进度不快，这与当年党的政策逐步放开有关。中央文件从几十个这不准那不准，到以后几十个“可以”、“也可以”、“允许”，体现了突破“左”的束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逐步放宽政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与地委和许多干部受“左”的思想影响有关。一些干部担心放开出乱，粮食产量受影响，造成减产。在

实际工作中，贫困地区推行责任制，相对阻力小，进度快，在高产区、集体经济力量雄厚区进度慢。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进一步解放，认识逐步趋于一致，政策进一步放宽，改革进一步深化。责任制改革经过多地试点、交流、比较、分析，逐步从自发到自觉，从又放又限制到全部放开，从不联产到联产，从秋联夏不联到秋联夏也联，最后形成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双层经营体制，完成了农村第一步改革。



牛建国讲述大包干责任制

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地委不要求全区统一，而是要求在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前提下，针对生产发展水平、管理水平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区别各种农活特点和不同农作物的种类等，哪一种办法最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最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就推行哪一种。但仍忌讳提“包产到户”要求各县必须坚持只包田间管理的原则，防止滑到“包产到户”。对生产长期落后、吃粮靠统销、用钱靠贷款的穷队，可以采取一些特殊措施，还可以将一部分村边地、小片荒地、边远薄地，按常年产量定产到劳力，定额上交，超产归己。对深山区的孤门独户可以按常年产量包产到户。生产队对一些多种经营项目，如养猪、养牛等养殖业，种菜、种瓜等种植业以及其他副业生产，可以定工定产到专业组、专业户、专业人员，实行奖赔责任制。定产指标要参照近几年的平

均水平，既不过低，也不过高，经过努力有产可超。超产奖励部分，提倡奖工分，社员要求奖现金和实物的，也可允许，但不能搞全奖全罚。

到1980年3月，全区已有26900多个生产队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占基本核算单位总数的96.4%。其中实行“五定一奖”、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有8990个单位，占30.4%。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不同程度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群众在总结1979年农业丰收的情景时说：“政策对，人大干，天帮忙，政策带来丰收粮”。新乡市郊、新乡县、温县、博爱、沁阳、孟县粮食亩产都达到千斤以上，原阳、延津两个困难县已达自给有余，整个农村呈现出一派生机。

到1980年12月，全区各地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主要有3种形式：

“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是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根据农林牧副渔各业的不同特点，分工协作，按劳动力的擅长和能力大小，实行有的到组，有的到劳力，有的到户的专业承包，生产队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包产部分统一分配，超产或减产分别奖罚；以合同形式确定下来当年或几年不变。这种形式的责任制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的特点和优点是其他形式责任制所无法代替。全区除一少部分贫困地区外，大部分社队特别是高产社队，基本上实行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特别是在新乡县、孟县、博爱、温县等条件比较好的县大面积推广。

“小段包工、定额计酬”责任制。这种形式是依照不同作物、不同季节、不同农活，分别制定劳动定额。社员在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生产任务后，及时检查验收，按照定额和不同农活的计酬标准付给相应的工分报酬。这种责任制在1980年夏季在全区占59%，秋季占25%。是全区两年来实行的主要形式之一。但也逐步暴露了一些弊病，主要是社员劳动和产量不挂钩，不能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同时农活验

收比较困难，不易保证质量，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干部偏重于产量，社员偏重于工分”的现象。

“五定一奖、联产计酬”责任制。在“三不变”、“四统一”的前提下，生产队对社员实行“定任务、定地段、定产量、定投资、定报酬”，超奖减罚。这种责任制在1980年夏季占21%，秋季占67%。它的显著特点是能够把集体生产成果同个人的经济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对提高秋作物产量，解决全区夏季产量高秋季产量低不平衡的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粮食高产区大力推行 联产计酬责任制

1980年秋季，一些中低产区实行了“统一经营，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形式，秋粮获得好的收成。在高产地区和集体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的地方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有较大阻力，这些地方成为全区推行改革的一大瓶颈。为此，地委加大了这方面的工作。

1981年5月18日至22日，经省委同意，由地委书记纪涵星带领各县县委、市郊委书记和地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28人到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就小麦高产队的小麦联产责任制和小麦

生产情况进行了参观学习。学习回来后，地委决定在新乡小麦高产区实行小麦联产责任制来取代小段包工责任制。

到1981年7月，新乡地区实行小麦联产的生产队共有9267个，占生产队总数的27.4%。小麦生产实行这种办法同秋季一样，收到明显效果，在长达8个月严重干旱的情况下，小麦总产仍超过1980年。据孟县、沁阳、博爱、汲县、武陟、修武、新乡7个县67个生产队的典型调查，基本上是队队增产。实行联产到劳的队，80%以上的户超产得奖。干部群众都高兴，他们总结四句话：“联比不联好，双联比单联好，固定比不固定好，全奖全罚比比例奖罚好”。

麦季联产责任制的出现，再次解放了思想禁锢。

第一，打破了实行小麦联产是前进还是倒退的顾虑。有人认为，小麦联产就是分田单干，搞倒退，有的甚至写信要县委坚决顶住。持这种看法的人大体上有四种情况：一是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仍然把“一大二公”作为衡量生产关系的唯一标准，把小段包工存在的平均主义因素，当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二是思想认识模糊，分不清所有制和责任制的不同性质，划不清联产计酬同分田单干的界限，

加上多年来集体干活，大呼隆，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三是有一部分干部过去曾经挨过批判，受过挫折，看到划分地块，定产到劳，分户收打，心有余悸；四是还有一部分干部过去吃惯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实行联产触动了他们的个人利益，借反对单干来抵制联产。事实上，小麦联产同秋季一样，都是在“三不变”、“四统一”的前提下实行的一种集体经济内部的生产管理形式，既能够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能



20世纪80年代初新乡农民在划分责任田

够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联产的结果，集体经济进一步巩固壮大，社员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二，打破了高产地区能不能实行小麦联产的顾虑。在部分高产地区，一个共同的思想是满足现状，怕产量掉下来，认为小麦产量已经七、八百斤了，“增产难度大，超产潜力小，干部心里怕，社员不愿包，机械投工多，联产没必要”，这种思想在全区有一定的代表性。高产地区和低产地区相比，增产的潜力是小一些，但并不是没有潜力。孟县缙村大队是个比较出名的小麦高产队，1981年全部实行联产到劳，获得大丰收。全大队最高年份的1978年，总产为210.7万斤，单产824斤，1981年总产达到233.5万斤，单产913斤，比1978年增长10.8%。类似缙村的高产队在全区并不是很多，600至800斤的队却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些队的潜力比缙村更大。

第三，打破了实行小麦联产影响不影响农业机械化的顾虑。有人提出，从种到收都包到户，要各种农业机械还有什么用处？在实行联产的过程中，拖拉机、播种机、水泵、电动机、柴油机、小型收割机、各种脱粒机械等使用率比过去还高，社员对机械化的要求更迫切了。据孟县缙村、汲县李元屯、沁阳龙涧、修武陈村4个大队统计，1981年新购置汽车3部，拖拉机8部，小型收割机9部，脱粒机20部，水泵45部，电动机18台，变压器两台，新打机井27眼，有的队还新修了不少硬化渠道。这些队的事实充分说明，机械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是大大促进了。

第四，打破了麦季联产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多，能否持久的顾虑。有一些社队干部认为实行这种办法好是好，就是麻烦太多，困难太大，特别是分户打场，很不好解决。实践证明，群众把它解决了，创造了不少比较成功的经验。如：利用小型脱粒机和老虎洞（一种脱粒机械的俗称）由生产队组织，划分小组，编排顺序，分

户脱粒；队出机械，自由结合，互相协作，分户单打；队造大场，各自摊晒，统一碾压，分户收场等。

经过实践，1981年夏季新乡小麦获得丰收，以铁的事实打破了以上思想顾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更高了。

联产到劳责任制为新乡地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较大贡献。它较之小段包工大大前进了一步，有许多好处已被群众所公认。但是，这种形式比较复杂，手续繁琐，需要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对农民生产和经营自主权仍有一定限制，不少群众反映，这种办法农民的责任不小权利不大。尤其是定工定产，反应更为强烈，定高了群众不愿接受，定低了集体亏空，很不容易合理掌握。还有与其他各业工分报酬平衡的问题，矛盾甚多。鉴于这些原因，农民从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实行“大包干”。家庭联包承担责任制呼之欲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点到面的普及过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称“包干到户”，欲称“大包干”，其做法是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自主经营，农作物收获后农户包交国家和集体应得的各种费款，其余产品或收入全归承包户所有。这种责任制形式在改革开放前一直被作为“分田单干”的“复辟倒退”行为被严厉批判和禁止。因此，几十年间广大农村都是“谈包色变”。

新乡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同样有一个从相对保守到逐步开放，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从条框较多到放开束缚的过程。地委要求实行这种责任制的农村，要注意解决好7个问题：1、分包的耕地，不准出租转让，不准个人起土、盖房，不准个人栽树；2、集体牲畜的所有权不能改变，可以集体喂养，统一使用，可以分槽喂养，养用合一，也可以采取

“集体所有，包养到户，保本保值，增值分成，统一使用”的办法；3、大型农机具不准变卖，应固定专人或包干到人管理，统一使用；4、按照生产队的实际吃粮水平，妥善做好“四属”、“两户”的照顾工作；5、尽量发挥集体经济作用，能够统一的生产项目，应尽量由队统一组织，集体水利设施应管好用好；6、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大小队干部的报酬，从上交部分提出一定数量给以补贴，这些人应适当少分地；7、随着生产的发展，要逐年适当增加包上交部分，增加公共积累，扩大集体经济成分，在社员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生产元气已经恢复、集体经济已有一定基础时，要加强引导，在群众自愿的情况下，可逐步由高级的



丰收后的农民积极向国家交售余粮

生产责任制来代替。由此可见，当时的新乡地委看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还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有些规定在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也作了相应的改变。

据牛建国讲述：在两年的生产实践中，“包干到户”责任制在原阳、延津、封丘三县和山区等贫困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且发展出乎意料的快。特别是在封丘等一些贫穷落后的地方，农民群众已自发分田单干了，时任封丘县委书记的史建青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一变革。但是，在多数地方，特别是那些经济条件较好、集体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的地方，推行责任制的问题还很多，阻力还相当大。这些阻力

主要来自于干部。一些领导干部一怕走错路，犯右倾错误，典型说法就是大包干就是分田单干，于是发出了“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叹。二怕产量掉下来，集体经济受到损失。因此顾虑重重，不敢大胆改革。农村基层干部还多了一层利益上的考虑。地委副秘书长杨金山、主持地委政研室工作的副主任千正旺和牛建国等在孟县赵改大队调查，征求对实行大包干的意见时，4个大队干部全部不同意，7个生产队干部有4个同意，而农民群众全部同

意，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代表性。

1981年7月3日至6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座谈会。从会上反映的情况看，经过一年多的试验，凡是实行联产承包的地方，绝大多数都

有不同程度的增产。尽管如此，在这些主要领导干部中，仍有一些同志心存姓“社”姓“资”的顾忌，被一些负面反映和具体问题所困扰。为推进改革，地委要求加大调查研究的力度。

1981年7月中旬，杨金山、千正旺、毕濯亭、牛建国等地委工作人员到武陟、温县、孟县、沁阳调查，并召开西部6县座谈会，听取县、社和基层干部群众对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见，大家的改革热情很高。这些县都是全国著名的高产县。时任孟县县委书记的孔茂山和县委办公室主任钱保江是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在他们的积极支持配合下，地委调查组深入缙村、谷旦、西虢、槐树等地方走访座谈，了解

到许多好经验、好办法。从开始的要不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何种形式的责任制，到后来的实行大包干的具体办法，调查组的同志都一一地同基层干部群众做了研究探讨。比如，实行大包干，地如何分，是按人、按劳还是人劳按比例，比例又是多大合适？分地以多少地块为宜？土地评定问题，定产问题，集体农机具、大牲畜的管理使用问题，上交提留问题，集体工副业承包问题，管水用水问题，植保问题，干部的职数、职责和报酬问题，几大员问题，奖罚问题，五保户优抚对象照顾问题，农技推广问题，财务问题，合同问题，打场问题等等，无所不包。许多在办公室议来议去难以解决的问题，到田间地头、水利工地、打麦场上、大小队办公室、农家庭院、饲养室，同群众一交流，什么办法都有了，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到1981年冬季，大包干责任制迅速突破原延封和山区等贫困地区，向广大平原地区的高产县、高产社、队蔓延，大有不可阻挡之势。随着它本身的发展和完善，人们对它的非议越来越少。一些认为是分田单干，复辟倒退的人，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原来持“治穷之道”、“权宜之计”看法的，在不断改变。较为普遍地认识到了这种办法不仅可以治穷，而且可以致富，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向找出了一条新出路。大包干不仅适应低产地区，新乡大部分地区都比较适应。但是，它作为一种责任制形式，也不是十全十美，同样需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刚开始实行大包干的地方，由于缺乏经验，思想准备不足，加之工作不够细致，还有不少问题。这些地方亟待解决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加强班子建设。一开始实行大包干的社队，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大队、生产队的班子出现了瘫痪半瘫痪状态。经过1981年冬1982年春的整顿，大部分已经得到恢复和健全。二是正确处理好统和分的关系，主要是解决好“统”的问题。“统”是指集体的统一组织、管理和经营，决不是去搞“一窝蜂”、“大锅

饭”；“分”是指分别承包、分散经营和管理，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自负盈亏。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正确掌握一个“宜”字。从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和发展生产出发，宜统的项目尽可能统一。三是逐年扩大包交部分。新乡地区过去实行的大包干多在贫困地区。经过几年的探索发展，这些地方的面貌初步改观，群众的国家观念逐渐增强。封丘县1982年出现的几个卖粮万斤户就是例证。

牛建国回忆：1982年8月，地委发出《关于组织县委书记调查研究的通知》，要求每县必须有30名公社以上干部参加。地委组织了4个组，分别到博爱、原阳、辉县、武陟开展调研，杨金山、千正旺、牛建国和博爱县委书记杨有才一起，于8月23日到博爱县苏家作公社吉庄大队调研。调研组一行吃住在队，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指导干部群众开始实施大包干的具体工作。拟订方案，清产核资，算账对比，实地考察，模拟运行，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8月31日，地委书记郝玉门带领王法祥、原乃德、孙培新、赵秀志等也来到了吉庄，与调研组一起开展工作。到9月4日，郝玉门看到全区推行大包干的条件已经成熟，立即通知县委书记到温县召开现场会。会上，大家情绪异常高涨，纷纷表示要抓住麦播前的大好时机，立即推行大包干。散会后各县抓紧工作，很快形成了“分田分地真忙”的热潮。

1982年秋季，全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实行大包干的社队急剧增加。高产县博爱县由15.1%增加到64%，温县由4.6%增加到70%，孟县由3.2%增加到89.7%。到1982年底，全区有90.8%的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34054个生产队中31387个实行了大包干，占92.17%。并且出现了64675个专业户、重点户，出现了7714个新的经济联合体。

（作者单位：中共新乡市委党史研究室）



三潭八壮士

1948年夏季，在辉县西北部太行山上，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展开了一场激烈战斗，即传颂至今的“石门沟粮库保卫战”，此次战斗，涌现出闫金保等八位烈士。

6月17日，驻新乡国民党40师106旅316团、317团、新乡专署保安团、还乡团纠集辉县保安团，出动汽车、马车130余辆，兵分三路向上八里石门店进犯，企图夺取石门沟西坪粮库公粮。为确保主力部队布阵痛击敌人，闫金保排奉命担任掩护任务，最终因寡不敌众、腹背受敌，全排战士大部分阵亡，仅剩8人仍顽强奋战，直至弹尽路绝。他们宁死不屈、砸坏枪支，相继从数十丈高的山崖跳下数丈深水的三潭，除1名战士被树木草丛掩蔽幸免于难外，七名壮士均壮烈牺牲。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再现太行山，壮士的鲜血和生命为太行七分区四十九团主力部队痛击敌军赢得了宝贵时间，主力部队全力反击，敌军狼狈溃逃，此战毙伤敌军400余人。

三潭革命烈士心系人民，情系太行，青山碧潭辉映着勇士的雄姿，苍松翠竹颂赞着烈士的英名。原南疆军区司令员、辉县籍战斗英雄郭兴在英烈亭内竖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激情题词“勇士屹立太行头，浴血奋战杀敌寇。粮尽弹绝无退路，一跃黑潭写春秋。”是对三潭革命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深情颂扬。



阮财声情并茂回顾当年战斗情景

阮财，辉县市上八里石门店村人，党员，现年86岁。亲身经历了1948年的石门沟粮库保卫战，并参与运送烈士遗体出山。



高山碧潭记录着八壮士跳崖壮举



辉县市政府在烈士牺牲的地方修建英烈亭并立碑以缅怀三潭八壮士

四十七烈士



1984年团市委与大块乡党委在陈堡立碑纪念烈士

1944年初春，林南战役刚刚结束，八路军太行七分区组织一支48人的武装侦察队从林县合涧出发，深入日伪控制的新乡道清路南部地区侦察敌情，查勘地形，为反攻做准备。3月4日凌晨，侦察队到达新乡县西北秀才庄（当时属伪辉县一区管辖），伪保长魏化明假意派饭，暗向联庄会反动骨干分子余作乾、魏子宪、魏贤珠等报信。反动武装集合攻打侦察营所驻的大庙，打死一名哨兵，同时燃放炮号，周围块村营、孟庄、樊城、石庄等联庄会会众向秀才庄聚拢。侦察队队长雷泽民迅速指挥队伍朝东

南、东北两路突围，但因为不熟悉地形，先是误入浇过水的麦田，继而又被卫河挡住去路。追赶人群潮水般涌来，侦察队员们虽然手里有枪，枪里压满子弹，面对大量不明真相，被反动联庄会头目煽惑裹胁的群众，却不能放一枪。47名侦察队员就这样被包围、缴械、捆绑起来。其中46名侦察员被押送辉县城（1名卫生员给村民治病，被保脱险），关进监狱。3月14日，44名八路军战士牺牲在日本兵刺刀之下。两三天后，队长雷泽民、副队



四十七名侦察员在此地秀才庄被捕

长田玉山被杀害于辉县城南文昌阁附近。由于杀害44名烈士是秘密进行的，具体牺牲地点一直不详，直到1964年10月，新乡县组织民兵兴修陈堡北堤河谷的水利工程时，才在河谷的泥泞之中发现了44具遗骨，疑案终于真相大白。同时，也调查清楚了47位烈士的牺牲经过（长期以来一直认为47名战士无人生还）。1965年4月5日（清明节），经省、地市有关部门的积极准备，47位烈士的遗骨迁葬到新乡市烈士陵园。



四十七烈士静静地安息在市烈士陵园



被保脱险的幸存者周泰生



周泰生向四十七烈士敬献花圈

郟封是修武城东南一个较大的日伪据点，驻守着伪军刘明德部一个中队，中队下辖三个小队。他们白天在郟封镇，晚上抽两个小队撤回修武城助防，留下一个小队守营。郟封寨墙上，每隔二三百米搭一个窝棚，强迫群众住在里面守夜，每隔一个时辰敲一次锣。辉嘉独立营经过多方侦察，摸清了敌人的活动规律。

1945年农历正月十五夜，独立营营长蔡生金派郟国武等三人组成的行动小组，先头出发，从50多里外的宿营地顶着刺骨的寒风摸到了郟封寨边。

他们三人观察地形后，从距西门约200米的寨墙脚下，利用铁耙登上寨墙。为不使脚下发出响声，他们把鞋掖在腰里，赤着脚悄悄接近窝棚，当离窝棚只有几步远时，他们箭步跃到棚口：“我们是八路军，是来打伪军的。”郟国武亮明了身份。窝棚里两个敲锣的老乡，恨透了口伪军，听说八路军来了，高兴万分，继续敲锣，以示平安，迷惑敌人。

行动小组又向西门哨兵摸去。

西门有两个哨兵，冷飕飕的西北风刮得他们把头缩在大衣里。郟国武三人躲在暗处观察动静，瞅准时机轻手轻脚接近哨兵。当离哨兵只几步远时，猛扑上去，哨兵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乖乖当了俘虏。从哨兵口中得知敌人的口令，守寨兵力30人。行动小组解下哨兵的腰带和绑腿，脱了他们的军装，然后把他们捆得结结实实扔进了岗楼。郟国武让一个战士换上哨兵的军装守在西门，迎接独立营主力进寨。

郟国武带另一个战士向敌队部闯去。敌队部哨兵见过来两个人，忙拉动枪栓问道：“口令？”郟国武二人一边答，一边利箭般冲了上去，刀光一闪，结果了哨兵的性命。刚收拾完哨兵，敌值班班长哼着小曲从外边鬼混回来，还没到门口，突然被按倒在地，嘴被堵住。行动小组

用绳子把他捆好后，扔到一间空房里。

天将黎明，还不见独立营的踪影，留在西门的那个战士急匆匆找到郟国武，说：“时间紧迫，如等到天明，再打炮楼就困难了，对我们撤出也极为不利。”

郟国武沉思片刻，果断地说：“对！虽然敌人十倍于我，但他们都在睡觉，只要我们三人配合好，就能制服他们，拿下炮楼。”

行动小组准备提前行动，不再等独立营主力。恰在这时，炮楼里走出一个伪军，连眼都没睁开就“哗哗”地小便。郟国武三人乘其不备将他按倒在地，低声命令：“我们是八路军，带我们进炮楼！”这个伪军吓得魂不附体。郟

郟封突袭战

■ 郑龙喜

国武叫两个战士守住东屋门，他押着那个伪军走上炮楼。刚进炮楼门，走在前面的伪军便喊：“不好了，八路军把我们包围了！”郟国武扳动扳机放倒叫喊的伪军，随即抱起机枪对

准其他还未起来的伪军：“不许动！谁动打死谁！”伪军迷迷糊糊不知道来了多少八路军，一个个吓得蒙头盖脑缩进被窝。与此同时，守在东屋门口的两个战士向屋内射出几排密集的子弹，屋内敌人乱作一团。郟国武趁势高喊：“二连点炮楼，三连准备爆破！”其他两个战士一个喊：“报告营长，爆破准备完毕！”另一个喊：“敌人不投降，就送他们上西天！”东屋里的敌人听外边喊个不停，以为是八路军大部队包围了他们，哪里还敢顽抗，纷纷将枪支扔出窗外，举手投降。

天刚亮，独立营主力赶到了。全营同志看到行动小组3个人俘敌30人，高兴地说：“真是奇迹！”

这天正逢郟封的正月十六“叮当会”，赶会的群众见八路军拿下了敌炮楼，喜气洋洋，“叮当会”也更热闹了。

习仲勋视察新乡地区三市两县

■ 秦志新



习仲勋（左）视察新乡市
王世龙摄



习仲勋（左四）视察七里营时与新乡市各级
干部合影 王世龙摄

1959年5月26日至30日，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及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在河南省副省长李庆伟、中共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地委书记处书记张超等陪同下，到新乡地区所辖安阳、新乡、焦作市和新乡、武陟县视察。

习副总理一行于5月26日抵达安阳，听取中共安阳市委的工作汇报后，到安阳钢铁厂、水冶钢铁厂和李珍矿区视察。习副总理在高炉前、轧钢机旁及矿山工地上与工人亲切交谈，勉励工人努力生产，提高钢铁质量和高炉利用系数，降低成本。他说：“在钢铁生产方面要抓住重点，突出重点，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产量。”习副总理还十分关心工人的安全生产和生活福利问题，详细询问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劳保措施和生活情况，使在一线生产的工人受到很大鼓舞。

结束对安阳的视察后，习副总理来到新乡，先后视察了新乡钢铁二厂、新乡棉织厂等单位。在新钢二厂，他询问了该厂生产的生铁成本、质量、焦比和脱硫磷办法。在新乡棉织厂，习副总理仔细观看了提花车间的生产情况，当看到正在生产中的各种花布后，欣喜地对身边的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说：“这个厂是你们新乡地区的一朵花。”

5月29日，习副总理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首先听取了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杨济田的工作汇报，之后参观了该社的棉花试验田和已经黄熟即将开镰收割的丰产小麦，还参观了公社办的养猪场。习副总理对七里营公社的工作、生产及社员生活情况表示满意，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在获得夏粮丰收的基础上，争取秋季更大丰收。接着，习副总理一行又视察了引黄总干渠、七里营公社发电站、武陟发电站和人民胜利渠跌水闸。

5月30日，习副总理到焦作市视察了焦南、焦北钢铁厂、王封煤矿和焦作耐火材料厂，之后前往郑州视察。

（作者单位：中共新乡市委党史研究室）



抗日期间新乡人民 冒死营救美国飞行员

1945年，正当抗日战争转入全面反攻阶段时，在新乡县和获嘉县发生了一起一百多人参加的冒死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感人故事。

天上掉下美国飞行员 新乡人民勇相救

这年3月20日(农历2月7日)下午5时许，随着一声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停在获嘉县亢村车站上的一列日军装满弹药的列车被炸成了碎片。执行轰炸任务的3架美军飞机中的一架中弹起火，飞机残骸栽进庄稼地里，飞行员跳伞，降落在获嘉县刘固堤村西。

这个跳伞的人叫加布里埃尔·狄索斯威，

是当时骁勇善战的有“飞虎队”之称的美国援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中校飞行员。他揍敌心切，俯冲轰炸时飞得很低，被日军的地面炮火击中。日军见他跳伞，立即包抄追赶过来。和他同来的另一架飞机见状马上向日军俯冲扫射，吓得日军不敢再往前追。狄索斯威趁机跑进附近两道7米多高的旧黄河夹堤中间。这时，有3个中国青年农民向他跑来。这3个人是刘固堤村的王振兴、王兆业、王俊瑞。当时，他们就在不远处，发现有人跳伞，日本兵狂追，便断定此人一定是抗日的好人，便勇敢地跑过来相救。

跑到跟前，他们才发现这是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他们打着手势向狄索

斯威表示救他的意思。虽然语言不通，狄索斯威还是从3个纯朴的中国青年脸上读懂了他们的好意，他感激地同3个人一一握手，并作出赶快逃生的手势。

周围层层都是日军的据点，带着这么一个显著的目标，逃到哪里呢？这时天渐渐黑了，3个青年人商量决定，趁夜色掩护把狄索斯威交给抗日政府县长张建成保护。他们步行三十多里，在新乡县与获嘉县交界处的南陈庄找到了张建成。张建成连夜安排他们休息，马上与有数百武装兵力的新乡县抗日自卫团副司令郭家林联系，请他救护狄索斯威。郭家林慨然应允。他找来了焦作煤矿工程师李承之当翻译，当晚用马车把狄索斯威接到他的司令部。经李承之的翻译，双方才弄清了对方的身份和意图，狄索斯威非常高兴地伸出大拇指：“你们真是好样的！”

美国飞行员度日如年 新乡人尽心保护

郭家林的司令部每天人来客去，也不是隐蔽的好地方。他就和参谋孙家宾商量对策。孙家宾主动提出：自家有个防劫匪的土炮楼，就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虽然显眼，但却相对安全。郭家林认为有道理，当晚把狄索斯威秘密转移到位于新乡县东营村的孙家土炮楼内。郭家林让翻译李承之日夜陪着狄索斯威，又让孙家宾的弟弟孙家相照顾他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营救人员千方百计和西安美空军指挥所联系营救事宜。

狄索斯威生活不习惯，不会用筷子，吃面条用嘴吞。为了满足他的生活需要，营救人员想尽各种办法到新乡城里弄来面包、牛奶，还冒着危险穿过日寇据点陪他到大召营学校澡堂洗澡。由于西安方面迟迟没有回音，狄索斯威开始怀疑营救人员的诚意。他焦躁不安，数次不顾一切往炮楼外跑，还每天用水果刀在自己

的皮鞋上划一道痕迹作为落难的纪念，就这样度日如年般地在土炮楼内生活了30天。

新乡人冒死修飞机场 美国飞行员安然脱险

10多天后，西安方面终于有了回音，不久又派来了一个叫田曙新的营救人员，打算用飞机把人接走。来飞机就得修飞机场，这可是登天的难事。且不说人力物力困难，单这风险就叫人胆寒。日寇到处张贴告示捉拿美军飞行员，举报者赏10万大洋，窝藏者抄家灭门，血洗全村；狄索斯威所住的孙家炮楼，北有道清铁路，东有平汉铁路，四周都是日军的据点，汉奸乱窜，若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李承之却临危不惧。他说：“这是抗日的大事，危险也得干。我认为，地点选在新乡县的店后营村，负责人选王清田合适。”他接着给大家作了进一步分析：店后营村比较偏僻便于隐蔽；土质坚硬适宜修飞机场；群众觉悟高能完成任务。村里的王清田是小学校长，很有民族气节和群众声望，曾长期掩护抗日干部，处事干练。听了他的分析，大家点头称是，给王清田一谈，他果然答应。

场地一确定，迅速电报西安，西安回电，4月24日（农历3月13日）晨飞机到达。营救人员立即分头行动。王清田走东家串西家动员群众，村民们都表示：坚决支持，一定保密。4月23日夜8时许，由郭家林带来的和店后营村的百十多名青壮年农民用牲口拉着80套石碾来到村西北的麦田里。看到已经秀齐穗的麦子，有人不忍下手。此前，连续3年遭灾，加上日本人的掠抢，村里人逃荒要饭饿死了许多，都眼巴巴地盼着麦子成熟，可现在要把这好端端的救命麦子碾掉，实在叫人心疼。王清田却指着自家的麦田，果断地说：“先从这儿碾！”

王清田以吹口哨为号，指挥村民干了大半夜，碾出了一个占地100亩左右的平展展的飞

机场，又在周围铺上白布，摆了十几面大镜子，堆起了许多干草，准备给飞机指引目标。王清田让村民们回家隐蔽，自己和郭家林、李承之、田曙新把头天夜里已转移到他家的狄索斯威接到临时机场等候。

4月24日凌晨6时许，一阵嗡嗡声响起，4架飞机自西南方向飞来。1架战斗机到距临时机场不远的大召营火车站上空来回扫射，迫使日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露头；1架战斗机在临时机场上空盘旋监视掩护，第三架战斗机引导小型C-5号轻型飞机降落临时机场。狄索斯威脸上多日的愁苦一扫而空，激动得像个孩子。他劝王清田、李承之、郭家林、孙家宾随他到西安，以免遭日本人的报复，但4人表示，他们要留下来做善后工作，保护家人和乡亲。狄索斯威只得和他们一一告别，交待赶快撤离，说一会儿要轰炸临时机场以掩人耳目，然后依依不舍地登上了飞机。

飞机飞走了，大家急忙四散隐蔽。王振兴、王兆业、王俊瑞逃往外地，王清田则利用自己社交面广的优势，频频请客招待，花巨资贿赂搪塞。日伪汉奸窜进村子，挨家挨户调查，威逼利诱村民讲出真相。但村子里二千多口人，无一人动摇泄密。敌人抓不住把柄，一时也无计可施，再加上临近日军战败，得了好处的皇协军

和日军头目也就没有再追究。

被营救的狄索斯威在后来的对日空战中屡建奇功，胜利后回到美国，晋升为4星级上将，担任美军驻欧洲空军司令员。1982年他的夫人作为中美恢复邦交后的首批议员代表访华，同时寻找丈夫当年的救命恩人，却因种种原因未能找到；1995年3月狄索斯威致信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华人杰，希望能在中国见到当年救助他的恩人，也因年事已高（时年86岁）未能实现愿望。1997年11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1998年3月2日《中国日报》（英文版）和1998年6月13日《华盛顿邮报》等中美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湮没多年的秘闻。狄索斯威告诉记者：“当年如果日本人抓住他，他肯定活不了；如果日本人抓住救他的人，那些人也肯定得死。”

事情虽然过去了近60年，但中美两国人民为抗击日寇同仇敌忾，同生共死的深情厚谊却至今使人难以忘怀。

（文章摘自《新乡五千年》）



如何编写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专题

(一)

■ 党言

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和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2013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对深化党史研究提出了“一突出两跟进”（进一步突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研究，即时跟进党中央的步伐、即时跟进历史前进的步伐）的明确要求，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提出开展改革开放实录的撰写工作，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专题的编研提到了更高的位置。本刊分作两期对如何编写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专题作一简述。

一、专题的确立

如何确立专题，一般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考虑：

其一，围绕改革开放时间段来确定。当前一般将改革开放新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召开（1978年12月—1982年8月），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邓小平南方谈话（1982年9月—1992年1月），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阶段；第三阶段：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到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1992年2月—2002年11月），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第四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现在（2002年11月—），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方针、政策、任务和目标各有侧重。要准确把握时间段，对我们确定专题的主要观点、划分段落、写作重点、评价得失和总结经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二，要突出党史的主线。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工作重点不同，主线所反映的内容也不同。新时期的主线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其三，要突出地方特色。要注意把与上级决策有关的，在贯彻决策过程中本地有创造性的、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挖掘出来，围绕本地区改革发展的重大成就、富有特色和亮点的成果来确定专题，具体包括重要决策、重要举措、重要事件、重要成果、重要经验等。

其四，要切合实际。第一，注意选题的现实性。即根据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需要，选择那些最有现实意义的题目。第二，注意选题的战略性和前瞻性。选题不仅要考虑现实的需要，还要具有战略眼光，应考虑到国家和人民长远的需要，注意题目的历史价值。第三，注意选题的新颖性。即所选题目应当是为社会某一方面所关注，并且它所包括的材料能够有助于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中尚未解决的、尚未找出的或阐述得还不够明确的问题的研究。

其五，要融合新的思想和理论。改革开放30多年，党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许多新的理论概括和阐发，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

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为我们进行党史专题的编写提供了新的认识高度和认识角度。

二、充分掌握并核准史料

占有充分的史料是编写专题的基础，而核准史料是编写好专题的关键。

（一）充分占有资料

征集史料要遵循“征集宜广，挖掘宜深”的原则，即一要全面，二要完整。党史专题的资料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文字史料，包括文献资料、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图书资料，党委政府文件、文献、档案、报刊、日记、信件、标语、布告、传单、回忆录、专著、论文、统计年鉴、大事记、地方志、重要会议、领导讲话等都应在查阅范围内。二是口碑资料。口碑资料的获得要着重去采访当事者、亲历者、当年的领导及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的老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省里出版的《河南经验：亲历改革》，以原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市长等为访谈对象，从河南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者、组织者、实施者的视角，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就是征集改革开放新时期口述资料的范例。亲历者的解说最生动，往往起着“画龙点睛”的妙用，在我们征集和熟悉材料的过程中特别重要。三是实物史料。主要包括党史文物、遗址、遗迹，还有照片和录像史料等。

（二）材料的核准甄别

核准史料是编写好专题资料的第二步。具体方法有五种：一是理证，即用推理的办法来核实。理证就是用推理的方法对党史资料进行考核订正，也就是用推理的方法考察资料所记的史实是否合乎情理。所谓“合乎情理”，就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常识，合乎一般的逻辑常识。二是文证，即利用文件进行考证。将各种文字资料及口碑资料、实物资料放在一起加以分析，求取书证。一般情况下应当以档案资料为准，以口碑资料为佐证。三是旁证，就是利用与其

有关的事件来核实订正史料。四是人证，即寻找证人、当事人，核实资料。五是物证，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实地踏勘，求取物证以核实订正其他史料。因此，在这一个环节中，只有了解熟悉资料，综合运用上述方法，才能更好地考证、使用资料。

三、拟定编写提纲

在熟悉资料的基础上，要对专题进行通盘考虑，认真分析征集所得的全部资料，勾画出事件产生的背景，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事件的结果和经验教训，谋篇布局拟出编写提纲。提纲拟定要做到：一是要提纲挈领、纲举目张。要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归类分析，从中提炼出最能揭示专题文章本质意义的东西来。二是提纲的每项小标题要集中。所谓集中是指每项小标题所包含的内容是丰富的，也是高度概括的。它们必须具备一个相同点，就是要集中于专题文章的中心思想，为中心思想所统帅。标题是文章的眼睛，既要准确达意，又要简明扼要，生动醒目。然后，根据资料情况，围绕每一部分所要反映的中心内容，立好小标题。这样，一篇专题文章的框架结构就算搭起来了。提纲拟定后，可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仔细推敲确定，以做到事半功倍。





新乡地区大跃进记事（续一）

王玉堂 张寅生 王定邦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按照会议的指导思想，整顿人民公社，纠正“左”倾错误，虽然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但是如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情况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所谓右倾错误之后，形势又急转直下。会议认为，“对于实现今年的继续跃进来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

庐山会议后，河南省委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以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系统地揭发批判了某些干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一些地市领导干部在会上作了检查。三级干部会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河南的大跃进形势和整个工作说成一团漆黑。接着，

《河南日报》发表社论：《斥包工包产到户的荒谬主张》。9月29日，省委将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主张在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的材料报告中央，中央以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批转各省、市、区党委，要求各地党委应该找出一批典型，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阴险面目彻底暴露，把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把一切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彻底批臭。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和部署，1959年10月26日地委下达《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方案》，明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耿起昌是右倾势力的总代表。”他的主要右倾错误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举办公共食堂，否认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他主张生产和生活组织规模越小越好，越分散越好……他认为社会主义集体生产和社会主义集体生活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自由，打乱了生产秩序，没有生产责任制了，农民生产不积极……他在5月间趁着整社算账的机会，打着

加强田间管理，保障秋季大丰收的旗帜，提出‘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奖70%到90%）’……凡是实行包工定产到户的地方，牲口都分散到组，农具都分散到户……”

耿起昌及新乡地委在1959年春整社中推行的包工定产到户责任制，是针对公社化后农业生产管理混乱的情况而进行的一次有益探索。应该说，这种责任制比较符合当时的农村实际，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但是，反右倾斗争中，这成了耿起昌的主要右倾错误，围绕



包工定产到户责任制，列举大量罪状，指责耿起昌的做法是反对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否认集体经济优越性，恢复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

为了消除耿起昌的影响，地委决定在全区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把整风提到“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的高度。全区参加省、地、县三级党校整风学习班的共有23470人，通过学习中央、省委有关反右倾的指示，开展向党交心运动，90%以上的党员干部交待了不同程度的“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和右倾活动”，并联系所谓以耿起昌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右倾言论进行批判。据统计，全区批斗“重点人”7454人，这些“重点人”大部分被定性为“严重右倾”，

受到各种处分。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直扩展到基层，违背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式。因此，反右倾斗争之后，“左”倾冒进错误再次发展，在粮食征购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上，采取了“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1959年全区实际产量为37.8亿斤，错误地估计为74.3亿斤，征购12.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32.5%。完不成任务的就在粮食征购会上批判斗争，采取强硬的办法，出现了征购严重透底的问题。有的地方为了完成任务，开展反瞒产，挨家逐户搜查农民家里的口粮，甚至把新媳妇的被子、枕头里的棉花也搜出来，顶统购棉花任务。农村口粮严重不足，不少食堂喝的是能照见人影的稀饭。人、畜体质大大下降，生育减少，疾病增多，劳力外流，人畜非正常死亡，各种农具丢失损坏，大大丧失了生产元气。

大刮“共产风”，实行一平二调，动摇了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各级各部门共平调各种物资折合人民币4亿元以上，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56年到1959年，大队小队规模屡次变更，几分几合，从小变大，从大变小，群众说：“小变大，大变小，变来变去变不好，变得产量上不去，变得社员吃不饱。”

反“五风”与“民主补课”

1960年11月15日，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纠正十分严重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强调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

信阳地区在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曾发生大批农民群众被饿死的事件。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向省委、中南局、中共中央作了《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错误地认为信阳饿死人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进行大规模的残酷的阶级报复。提出要像土地改革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进行民主补课，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撇开原有组织，夺取领导权。对于原有组织中的干部，根据情节，分别采取集中整风、集训、特训及停职反省、撤职查办、管教反省、逮捕法办等办法进行处理。

信阳地委的报告经中央批转后，新乡地委根据信阳的“经验”，在全区开展了“民主补课”运动。当时要求“民主补课”搞彻底的标准是：(1)坏人坏事被彻底打倒；(2)查清漏网的地主、富农，消灭封建残余；(3)夺回“五权”(即党权、政权、兵权、财权、吃饭权)，巩固地确立贫雇

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4)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苦水倒净，怨气出完；(5)扎正根子，培养出一批新的积极分子。

整风会、集训班、特训班从地区一直办到公社，先后集中了大批生产队、大队、公社、县的各级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会批，小会斗，拳打脚踢，拧耳朵，抹花脸，跪炉渣，穿孝衣等。特训班更是厉害，站着几道岗，不许自由活动，规定一天只能吃四两粮食。

纠正干部中存在的“五风”是必要的，但是错误地采取了“民主补课”的方式，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了大批基层干部，使党的工作受到损失。

作者简介：王玉堂，新乡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寅生，新乡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党组书记；王定邦，新乡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上接36页)

1931年2月，时逢学校放寒假，李毅之、傅德明等返回新乡。10日夜，李毅之、傅德明、靳岐山、毛光华、郭瑞亭、夏清亭、李耀南、杨世瑞等10余位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聚会在桥北小学，交流各地革命斗争情况，谈论红色革命根据地日益壮大令人振奋的消息，分析新乡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研究同反动派进行新的斗争。不料，他们的聚会被校董刘成坡(刘亦在县保安队干事)发现，刘立即向国民党县党部报告。

2月11日凌晨，张寿庵、王寿山等带领县保安队20多人，荷枪实弹，包围了桥北小学。先由刘成坡叩门，校役知是校董，遂将校门打开，保安队员顷刻闯入，见人就抓，傅德明、靳岐山、毛光华、郭瑞亭等被捕，李毅之机智地躲开保安队，越墙脱险，毛光华蹭开绳索，借夜色顺

卫河河堤逃脱。

傅德明等被关押在国民党县政府看守所牢房，县反动当局对“犯人”逐一提审，要他们承认“聚众滋事”、“通匪”的罪名，遭到傅德明等的严正拒绝。在勒索了大量钱财之后，县党部陆续释放了部分被捕人员，而将傅德明、郭瑞亭、靳岐山、杨世瑞等4人押解开封，投入省保安司令部监狱。

傅德明等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诱骗、威逼、酷刑都征服不了他们的革命意志。1931年5月4日，傅德明英勇就义。此前靳岐山、郭瑞亭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杨世瑞取保释放。

桥北小学事件再次说明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新乡革命者并没有被征服，他们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永昭史册。

工作在封丘

■ 聂峻华



1979年，封丘县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新乡地委派来了新的县委书记、县长和两位副书记。我当时是办公室副主任，县委写会议材料、工作报告的工作都压在我身上，常常写材料到深夜，有时一连熬几个通宵，晚上只要书记办公室的灯不熄，我就一直守在县委办公室。

我的工作态度终于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和认可。1980年，我被任命为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我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激动、有高兴、也有感激，同时我也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在工作中一帆风顺时好办，身处逆境时才是考验，只要为党踏踏实实工作，把自己的荣辱看得淡一点，终有一天会得到组织的理解和信任。

那时，封丘的县委书记、县长思想都比较解放，针对封丘实际，提出了要在全县实行“大包干”，即：将土地按人头分包到户，牲畜、农具、机器作价到人到户，由社员按照生产计划自主经营。每年分秋、夏两季，向国家交农业税，出售余粮，上交集体提留，剩下的自己支配。县委讨论研究，常委们一致同意，县委常委让我抓这项工作，并且让我组织县委办公室和农委人员搞调查研究，起草向地委的请示报告。

我很乐意做这项工作，因为在东北劳动锻炼时，我亲身经历过社员在生产队里干活出工不出力的情景：上工靠敲钟，下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上工一块布，收工一条裤，干一天，不分出力大小，干活多少，男劳力一律10分，女劳力一律8分。这种把一家一户的农民人为地约束在集体的土地上的体制，确实调动不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我对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问题就有过思考，我想利用这次机会，找出一条适合封丘农业发展，解决广大农民温饱问题的路。我除了抓好办公室日常工作外，把精力都集中在抓生产责任制上。我组织一个调查组，深入到公社、生产队，和干部、社员座谈，很快弄清了全县现状，了解了基层干部的要求和广大社员的呼声。

解放前，封丘县是出了名的穷县，水旱、蝗虫等自然灾害年年不断，加上阶级斗争造成的人

祸，半年糠菜半年粮，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全县人民常年在死亡线上挣扎。建国后的几十年里，人民生活有所提高，但生产发展缓慢，粮食产量徘徊不前，温饱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解决，仍然是“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

陈桥公社的东张八寨，历史上贫困落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人均粮食产量最高年份是50公斤，最低的只有2.5公斤。这个公社的三合村，1978年以前，20年累计吃统销200万公斤，花国家救济款60万元。两个村的劳动日值六七分钱。孙庄公社的胡蔡寨、仝蔡寨、孙蔡寨等村，由于地处背河洼多盐碱渍生区，这里的人们“谈卤变色”，种庄稼不成，人们靠刮盐扫碱、熬盐淋碱卖钱过日子。面对这种长期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基层干部迫切要求分田到户，社员们要求更是强烈，他们说：“给生产队干活，活不重，可连红薯面窝窝头都吃不饱，干一天活只六七分钱，只能买三支前进烟。把地分给个人，扣除公粮，队里留够，下剩的都是自己的，这样俺就有劲儿了。”

经过调查，我认为“大包干”这种生产责任制形式符合封丘县的实际。但是，与上级的要求不一致，如果搞不成功，我就要承担责任。经过再三考虑，我还是坚信自己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并以支持实行“大包干”的意见向县常委会提交了调查报告。

县委领导决定让我立即向地委汇报，当时正赶上地委召开各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各县都是汇报提高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唯独封丘汇报的是准备在全县推行“大包干”。当时的地委秘书长听了我的汇报后说：“人家走的是金光道，唯独你封丘要走独木桥。”我赶紧把调查的内容、县委的意见又作了详细说明，最后带着乞求的口气说：“秘书长，这个独木桥就让我们走走试试吧，如果能解决5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就是走独木桥也值得。”最后，秘书长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提出了要求：“先

搞‘大包干’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县推开。”

回来后，县委立即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并发出《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座谈会纪要》，要求全县因地制宜，在推行小段包工、“五定一奖”的同时，要积极搞“大包干”试点。于是，各公社迅速行动起来。1980年的下半年，实行“大包干”的846个生产队，占总数的73.1%。经过一年的实践和观察对比，“大包干”这种责任制符合封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简便易行，基层干部反映：干部好当了。群众反映：“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许多“三靠队”在不长时间靠“大包干”改变了面貌。

1982年，全县农村全部实行了“大包干”。当时，上边管“大包干”叫“联产承包”，而下边叫“分田单干”。不管怎么叫，社员把分到的田当成自己的，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社员在自己的责任田里精耕细作，常常是两头不见太阳，的确是一派男耕女织的太平景象，当时提留款少，化肥也便宜，加上稻改，粮食产量猛增。

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了21252.45万公斤。人均产量373.5公斤，农业总收入1496万元，人平均269.6元，社员个人所得182.2元，足1979年的3.3倍。原来最穷的孙蔡寨、仝蔡寨、胡蔡寨成为人均年产吨粮村，东张八寨人均纯收入达到683.8元，为1978年34倍。社员储蓄由1979年的56.2万元，增加到822万元。

几十年的“大锅饭”没有解决封丘县农民的温饱问题，为了使广大农民群众过上富裕的生活，我们没有墨守成规或“随大溜”，而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自己的路，为解决温饱问题，不怕担风险。

作者简介：聂峻华，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毛泽东 “打” “大老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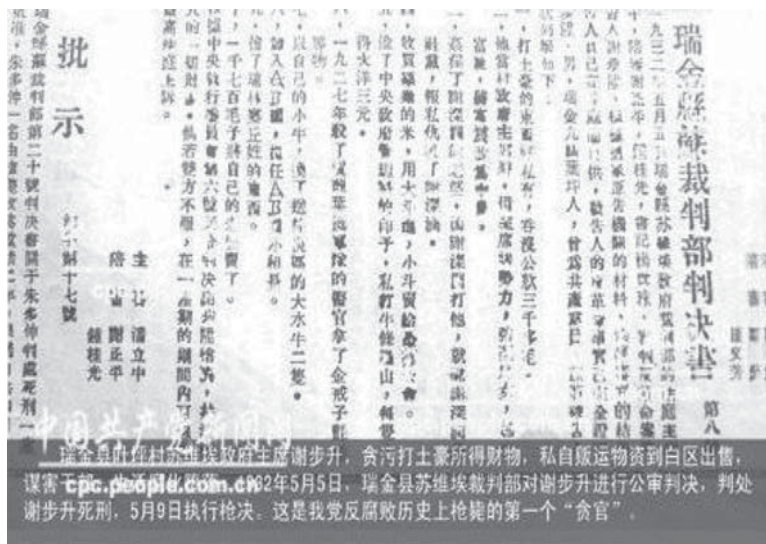
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谢步升

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正式开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在这次反腐运动中，处决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就是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枪。

苏维埃裁判部根据朱秀秀提供的线索，暗地对谢步升进行了调查。仅仅两天，裁判部就基本掌握了谢步升违纪违法事实。调查人员将有关情况向时为第一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审的何叔衡作了汇报。何叔衡向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

邓小平了解到案情后，当即指示由裁判部负责调查、速战速决。按照何叔衡的安排，调查组成员杨世珠又向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到谢步

升的犯罪事实后，马上表示：“谢步升案我听说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



关于谢步升的判决书

从1932年年初至1934年秋红军长征之前，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

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革命将领黄克功逼婚不成举枪杀人 毛泽东挥泪斩“马谕”

正当八路军夺取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平型关大捷，所属各部队正准备迅速向敌后进发，全国的抗日战争进入高潮之际，在延安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案件——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大队长黄克功逼婚杀人案。黄克功逼婚杀人事件，一时间在边区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国内外一些报刊把它当成共产党的“桃色案件”，抢先发表，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

黄克功本人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请求法院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当罗瑞卿把抗大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原原本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报告时，毛泽东很愤怒地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对于黄克功犯下的罪行，中央领导的心情也是很不好受的。黄克功是毛泽东的同乡，一个在井冈山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长征时任警卫团团团长，担负着保卫中央和毛泽东的重任，在战斗中身上曾留下了多处伤疤。在陕北简陋的窑洞里，当收到爱将黄克功的信时，毛泽东流泪了。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平时很器重黄克功，认为他出身贫苦，工作有才干，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轻，在黄克功被关押之后，还去看过他一次。但是，在情与法之间，在感情与大义面前，毛泽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并请雷经天在公审会上宣读了给黄克功的信。

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唐达仁被处以极刑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认为，举报信没有署名盖章，说明里面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更应该引起重视。他当即部署力量进行调查。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在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又派员到群众家里住下，明察暗访，初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浪费现象异常严重，可能还隐藏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

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并作出处理意见。

1934年1月4日，《红色中华报》第140期公布了这一处分决定。决定称，唐达仁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决定将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的财产；蓝文勋对于瑞金财政的收支全未理会，唐的贪污他是知道的，但不检举，直至中央工农检察部审查时，才说出曾查出唐贪污土豪刘绳仪罚款20余元。蓝文勋隐瞒唐达仁的贪污案件，有放纵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职查办，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左祥云贪污246元7角被处决 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

这是共产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厅等纪念物，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主任。这在当时是重大工程。中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

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施，集中了 10 万元的资金和物资。整个工程于 1933 年 8 月动工，11 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审查，结果发现



左祥云被处决后的相关报道

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 246.7 元，并有盗窃公章，企图逃跑等行为，犯有严重罪行。

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祥云。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愤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左祥云被抓获后，中央总务厅的腐败问题暴露无遗。1933 年 12 月 28 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1934 年 2 月 18 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肖玉璧蜕变为腐败分子被处决 毛泽东坚决不说情

陕甘宁边区检察机关审讯清涧县张家畔税务主任肖玉璧，肖玉璧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陕甘宁高等法院检察署经审查终结，认为肖玉璧贪污案证据确凿，遂向边区高等法院提起公诉。判决理由：肖玉璧身为边区公务人员，不能尽职责，廉洁奉公，利用职位实行贪污，克扣公款 3050 元，并携带款项和税票逃跑，叛变革命。此种行为对于边区模范政权之建立危害至大。依据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八项和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处被告人肖玉璧死刑。

边区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后，肖玉璧不服，并与执法人员吵闹并要求面见林伯渠，林伯渠念及肖玉璧是老红军英雄，便答应见他。肖玉璧见到林伯渠后就说被判处死刑太重了，并要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林伯渠最后答应了肖玉璧的请求。

最后，毛泽东对林伯渠说这次处罚肖玉璧与黄克功案一样，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由红军英雄堕落成为贪污犯的肖玉璧被惩处后，在边区引起了强烈反响。1942 年 1 月 5 日，



有关肖玉璧被处决的报道

边区《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评论指出：肖玉璧判处死刑了，因为他贪污，开小差，为升官发财以至叛变了革命；虽然他还当过一些不小的‘官’——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局长等等。据说，边区近两年来，贪污案件占总案件百分之五还强，反贪污的斗争是非常要紧的！

新中国“反腐第一刀”： 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

1951年秋，在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都发现了大量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有鉴于此，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并强调：“反贪污、

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是关系于革命成败，关系于全党、全军、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大问题。”以此为开端，历时三年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

刘青山、张子善案是“三反、五反”运动时期惩处的一个大案要案，也是反腐倡廉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逮捕张子善那一天，华北局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据有关资料披露，周恩来拿着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报告，气愤地说：“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禁毒、反对嫖娼的运动，我们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搞男女

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经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

（文章转载自人民网）



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现场

桥北

小学事件

■
史
文



桥北小学原校门

1931年2月，在新乡又发生了一起以刘峙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革命者的桥北小学事件。

1927年8月成立的以共青团员为主体的国民党新乡县党部，推进了新乡县革命形势的发展，但是，遭到新乡县反动势力的反抗。新乡县反动头面人物杨一峰（后曾任国民党河南党部书记长、省民政厅长等要职）宣称县党部同省党部没有关系，是非法组织，李毅之等人是“C·P”（共产党）分子。另一个大劣绅田仲韬则组织所谓的“乐群社”（取“君子群而不党”之意），与县党部分庭抗礼。在孙中山诞辰（11月12日）纪念会上，杨、田沆瀣一气，大小绅士随声附和，哄然而起，革命阵营同反革命阵营泾渭分明，辩论激烈。面对反动派的恶意挑战，共青团员们毫无惧色，他们义正词严地揭露“乐群社”，痛斥其背叛孙中山、践踏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反动行径。经过这次斗争，“乐群社”销声匿迹了，杨一峰的嚣张气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也由此激起了杨一峰等对李毅之、傅德明、何晓光等几名在县党部起主要作用的共青团员的仇恨。

1928年春，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派员到新乡“整理党务”，责令国民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否则以异党论处。新乡县全体共青团员在李毅之带领下，毅然拒绝登记，坚决辞掉在县党部的所有任职，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在杨一峰等人眼里，他们这种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必欲除之而后快。1930年10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刘峙当上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对共产党人采取更加严酷的捕杀政策，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执行委员杨一峰、新乡县党部书记长张寿庵、中统特务杨耀五等以为时机已到，准备向新乡的革命者开刀。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李毅之、何晓光、傅德明等被迫于1928年底离开新乡县，去北平求学。共青团新乡支部解体了，但斗争并没有停止，共青团员靳岐山任县城桥北小学校长，共青团员毛光华、郭瑞亭任该校教员，桥北小学成为新乡县城革命活动新的中心。（下转29页）



明星茶社里的 “生意”

■ 孙建设

入秋连着刮了几场风，街面上更加萧索了。

内战爆发以来，新乡成了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屯兵基地，运兵车源源不断通过这里向北驶去，火车站周围住满了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兵。就在这虎狼之地，一天清晨，噼噼啪啪炸响一串清脆悦耳的鞭炮，车站路南新开张了一家门面，店名“明星茶社”，两侧书大红对联，“水煮三江茶，酒醉四方客”。

明星茶社的伙计、掌柜就是王东明一个人，他20来岁的样子，细高挑身材，腰扎白围裙，显得很干练。这天，一位穿灰布长衫，戴墨镜的中年人，悠闲地走进茶社。王东明看见来人，眼睛一亮，将他引进里间，迫不及待地问：“大哥，有事吗？”

“我最近要进山一趟，咱们办的那批货，瞅机会送出去。”

“好哇，大哥，我跟你一道走。”

话音刚落，外面有人喊，“掌柜，掌柜的！”

“哎，来了。”王东明瞬间变出一副笑脸。

王东明再回到里间时，脸上的笑没了，他恳求中年人道，“大哥，你还是让我去根据地吧，在这里整天伺候些什么人！乌烟瘴气，快把人

憋闷死了。”

这中年人也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叫郭美。

“哦，你以为只有当八路军，刀对刀，枪对枪跟敌人干，才是战斗吗？”

“五魁首！”“哥俩好！”外间一片喧闹。

郭美摘下墨镜，手指把布帘拨开一条缝。店堂内坐了五六个国民党下级军官，歪戴帽子，敞开衣领，吆五喝六。郭美回过头问王东明，“兄弟，你知道怎么过河吗？”

王东明一时莫名其妙，我要求上山，大哥怎么岔到过河上去，便随口回答道，“搭桥过呗。”

“对呀，过河需要搭桥，明星茶社就是我们的一个桥梁，是我们战斗的阵地啊。”

王东明恍然大悟，可不是嘛，前些日子，就是通过一个常到这里喝酒的商人，搞到一批敌人禁运的物资。

郭美的手轻轻搭在王东明肩上，“走，伺候长官去。”二人相对一望，会心地笑了。

王东明径直走向一个正在撕吃烧鸡的军官，殷勤问道，“张连长，您还有什么吩咐？”郭美接过话茬说：“长官戡乱救国，理应慰劳，怎奈我兄弟开这个小店本钱有限，这点小意

思……”边说边掏出一包香烟，掷到张连长面前，“请张连长笑纳。”

被称作张连长的这位，其实只是一个少尉排长。他心里美滋滋的，咧开油光光的大嘴，朝坐在西墙角的军官可劲喊一嗓子，“听见了吗，赵排长，别他妈整天价唉声叹气的！”

郭美瞟去一眼，只见那位赵排长愁容不展，自斟自饮地喝闷酒。

“这位赵排长……”

“想老婆哩，哈哈……”

“就是，就是，当兵打仗，走南闯北，家中妻儿老母，咋能没个牵挂。”说罢，郭美又瞟一眼赵排长，见他的头耷拉得更低了。

“咳，管他娘，今朝有酒今朝醉……”“张连长”分明已有几分醉意了。

“敢问长官，一向在哪里辛苦？”

“不提不提，我们八十五师，尽摊上一些苦差事，这不，明天，派老子带人守封锁口，堂堂中央军，站岗放哨，他娘的，没劲！没——劲！”

“北口？——哦，喝酒，喝酒。”

郭美和王东明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

第二天，郭美装扮成小商人模样，后面跟着两辆运货的板车，货物将送到辉县薄壁镇中共新乡城工委驻地。今天他特地在墨镜上系了根红布条，这是害眼病的标记，是一种掩护。

到达通向辉县的必经之路城北封锁口，两个国民党士兵横枪阻拦，吹胡子瞪眼道，“上峰命令，过往行人车辆，一律检查！”

郭美神色自若，拿起车上装的瓷盘，在哨兵眼前晃了晃，“我和你们长官，可是老交情哪。”

“扯淡，都说是长官的朋友。”

“废什么话，快快检查！”岗楼里走出个军官。

郭美摘掉墨镜，迎上前去，“哟，巧了，是张连长呀，怎么，不认识我了？”

两个士兵诧异，排长什么时候高升了？

这位“张连长”却是大气不喘，端足了架

子问道，“原来是郭老板，又去哪里发财呀？”

郭美便谦恭地说：“小本买卖，想去那边换些山货回来，两位弟兄眼生……”

货车顺利通过封锁口，“张连长”哪里知道，这车是特制的，上面装着一般商品遮人耳目，暗层才是真正的禁运品——西药、油墨、纸张……

转眼到了中秋，这一天，赵排长早早去了明星茶社，仍旧坐在西墙角老地方，独自喝闷酒。圆月东升，月光凄冷，勾人浓浓乡思。郭美在赵排长身边悄然坐下，注视那张写满忧郁的苦脸。

“长官，给你算一卦如何？……长官满腹心事，愁眉不展，想必是儿行千里，家有老母，膝下无人，孤苦伶仃……”

“砰”，赵排长一惊，胳膊肘碰落了酒盅，瞪大一双茫然的眼睛，“你怎么知道？”

郭美自顾往下说，“刚刚赶走日本鬼，过了几天太平日子，又要打仗，换上我，哼，三十六计……”

“走……”赵排长惶恐失色，“谈何容易，昨天宪兵抓回两个弟兄，在大操场上当众处决了。”

郭美站起身，“如果你信得过我……”他压低声音，对赵排长如此这番吩咐一遍。

机车重重喘着粗气，就要启动了。王东明挟着赵排长的行李，仗着曾在铁路上做过工、人熟地熟的方便条件，躲过军警盘查，登上了列车。他隔着车窗，朝外面焦急张望。赵排长穿一身便衣，徒手，夹在乱哄哄的乘客中间，也混进来了。车上，两个人装作不认识，王东明用目光向赵排长示意了一下行李的位置，赵排长紧张之余，眼睛流露出无限感激的神色。王东明迅速跳下火车，火车鸣叫着，向南驶去。

国民党八十五师警卫连赵排长，就这样逃离了火坑。

（作者单位：中共新乡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新乡历史大事记

特别关注

2014年12月份

民进中央副主席刘新成莅新调研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12月1日至3日，民进中央副主席刘新成带领文物、文化专家对新乡市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进行调研，副市长周世杰、李瑞霞陪同。调研活动中，刘新成一行分别到辉县市、凤泉区、新乡县、卫辉市进行实地考察，详细了解新乡南太行、百泉、潞王陵、刘庄、比干庙等旅游景点的现状与以后的发展。在座谈会上，同行文化专家以《文化旅游融合推动新乡旅游发展》为题，对新乡市文化旅游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调研新乡市小麦生产情况 12月5日至6日，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到河南省调研秋冬种生产情况。在原阳县高标准粮田示范工程项目区，余欣荣详细了解2014年小麦播量播期、农民喜欢的品种、增产关键技术、代耕代种、托管服务等情况，并对土壤深耕深松及秸秆还田等情况十分关心，详细询问各项技术要点。

郑州金水区、新乡获嘉县签约金水·获嘉产业新城项目 12月8日，金水·获嘉产业新

城项目在郑州正式签约。金水·获嘉产业新城项目，采用“飞地经济”合作模式，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实现资源共享互补、互利共赢的一个跨区域合作项目，是全省首个“飞地经济”园。

2015年1月份

新乡市率先在全省全面推行乡村医生签约服务 1月1日起，新乡市在全省率先全面推行乡村医生签约服务，3100个乡村直接受益。农村居民以户为单位，家庭成员代表凭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自主选择乡村医生进行签约，每户家庭只能选择1名乡村医生签约。

中央“农村改革与发展典型”调研组莅新调研“三农”工作 1月6日至7日，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政策科学学会执行会长郑新立带队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典型”调研组莅新，调研人地挂钩政策试点情况等“三农”工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市领导王晓然、吴金印、李瑞霞陪同。调研组实地调研了西山土地整治项目现场、金门沟补充耕地储备项目现场及四和社区，深入了解该镇“三化”协调发展、土地流转、新农村建设等方面

情况。

河南省首家生态园林企业新三板挂牌 1月7日，新乡市山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录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标志着河南省首家生态园林企业在新三板挂牌成功。山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主要从事园林、公路、市政、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城市环境系统规划；城市景观设计、园林绿化苗木、花卉、盆景、草坪的培育、生产和经营，园林绿化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等。

全省优秀廉政戏剧《全家福》巡演至新乡

1月13日，市领导李庆贵、宗长青、范学贵、王炳奇、王保旺、赵艳、周建等和省纪委宣传部领导陈敬如、侯现福以及1200多名党员干部一同观看由河南豫剧院三团最新编排的优秀廉政戏剧《全家福》。

市委书记李庆贵主持召开县（市、区）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 1月16日，市委书记李庆贵主持召开县（市、区）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市领导舒庆、王炳奇、邢亚平、王保旺、赵艳、周建等出席会议。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李永出席会议并作点评讲话。会上，各县（市、区）委书记就抓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了专题述职。李庆贵对述职报告逐一进行点评，肯定大家总结成绩客观真实，剖析问题不遮不掩，制定措施具体明确，充分体现了对党建责任的清醒认识和转好基层党建工作的信心、决心。

2015年2月份

市纪委十届五次全会召开 2月2日，市纪委十届五次全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九届省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回顾总结2014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研究部署2015年的任务。市委书记李庆贵、市委副书记宗长青、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炳奇在会上发言。市领导范学贵、刘建华、陈祖刚、王炳奇、王晓然、邢亚平、王保旺、赵艳、孙国富、周建等出席会议。各县（市、区）委书记向市委递交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领导到辉县市调研 2月5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蒋旭光一行到辉县市常村镇仓房村，就移民安置、生活、生产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市委常委王晓然陪同调研。在仓房村，蒋旭光和当地村民进行了交谈，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并向当地主要负责人了解村民事务管理情况。

省委调整新乡市主要领导干部 2月11日，新乡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是西传达了省委关于新乡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李庆贵不再担任新乡市委书记，另有任用。

《人民日报》刊文解读新乡先进群体现象

2月26日，《人民日报》以《让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为题，推出了有关新乡先进群体的理论文章，从理论层面深刻阐述了新乡先进群体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关系，不仅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新乡市获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2月28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新乡市作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市长舒庆参加了会议。市人民检察院、市国税局、市财政局、河南省第二监狱被命名为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新乡县小冀镇、卫辉市汲水镇、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市凤泉区潞王坟乡金灯寺村被命名为第四届全国文明村镇。